

蘇聯經濟發展史

著 伯 道
譯 美 子 張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聯經濟發展史

著 伯 道
譯 美 子 張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聯經濟發展史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34128)

原著者 Maurice Dobson

譯述者 張子美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1950年9月初版 基價20元

原序

本書是就我二十年前舊著革命以來俄羅斯經濟發展史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volution) 一書的原範圍而更加推展。原著內有不少資料 (作者當時得力於史地芬 (H. G. Stevens) 先生的地方很多)，茲編入本書的第四至第九章。作者在戰時所寫的一本平時與戰時的蘇維埃計劃與勞工 (Soviet Planning and Labour in Peace and War) 小冊子內，也有數節，編列在本書的第十六章之內。但是革命後最初十年的史實，則悉經改編和重寫，並將時間延長了二十年；全書的結構，亦完全重經排比。

本書的各個部份，也許會使各種讀者感到不同的興趣。第一、第十三和第十四章，或許是經濟學家，第十五章，或許是經濟地理學家的主要興趣所在。經濟史家如展閱本書，所能引起他注意的，也許在第二至第十二章之間。第八至第十章，可能連同其前面的四章，對於研究比較經濟政策的學者有些興味。至於蘇維埃經濟發展的研究，與現世界所關注的問題，關係如何，我曾在導論一章中試加概述。本書為完成此一研究，有些地方不得不力求詳備，希望專注意特殊角度的讀者，不致因此而有所疑阻。

伯明罕大學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的貝可夫博士 (Dr. Alexander Baykov)，在本

書編撰的各階段，曾作寶貴的建議和批評；倫敦大學斯拉夫研究學院（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的羅次斯丹（Andrew Rothstein）先生和格拉斯哥大學俄文部（Russia Department of Glasgow University）的密勒（Jacob Miller）先生惠供資料，出借圖書和雜誌，並不辭勞苦的校讀作者原稿的大部，謹在此向上述諸君及斯拉夫研究學院和渣桑大廈（Chatham House）^①的圖書館員表示謝忱。至本書封裏及底頁的兩幅地圖，則出自余妻之助。

M. H. 道伯 一九四七年七月於劍橋。

① 譯者按，渣桑大廈為英國皇家國際關係研究院（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所在地。

譯序

沙皇時代的俄國，雖然幅員廣袤，人口蕃殖，在國際上亦駁駁焉追隨各工業強國之後，進入了帝國主義的爭奪戰爭；但在經濟上仍舊是一個極落後的國家，幾乎完全是以封建主義爲基礎的農業社會。大都市中僅有的工業發展，也大都操持在外國資本家之手。其廣大土地上的農奴階級和少數都市中的無產階級，在帝國主義資本和貴族地主階級的雙重壓迫之下，掙扎於飢餓的邊緣，生活是極端困苦的。但自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成功以後，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之下，於短短的三十年間，牠已經由落後的農業國家，一躍而居於前進的工業強國的前列。這一次英勇的「衛國戰爭」，不僅證明了牠工業的發展，已足夠滿足牠國內的正常需要，而且牠在重工業方面的成就，且可以建立起充實的國防，予法西斯侵略以及時的致命的打擊。這種成就的驚人偉大，雖是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也不能不加以承認。蘇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環伺之中，國際金融家一向都對蘇聯抱着懷疑而不合作的態度。牠居然能絲毫不假借外資的力量，完成她劃時代的經濟建設，其艱難締造的經過，是值得我們借鏡的。我國的幅員和富藏，與蘇聯不相上下，目前的經濟情形，亦與蘇聯革命初期的情形，大同而小異。如何由農業經濟轉變爲工業經濟，正是我們當前最重要最迫切的經濟課題，則蘇聯近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更是我

們所應努力學習的良好題材。

慕立斯·道伯(Maurice Dobb)是英國的名經濟學家，同時也是英國工黨的中堅份子，執教於英國劍橋大學，擔任經濟學講師，歷有年所。他不但對於經濟理論有很深的造詣，而且對蘇聯的經濟情形也有深切的研究，在英國堪稱為蘇聯問題的專家之一。平生所著關於蘇聯的書籍甚多，本書係就其二十年前舊作革命以來的俄國經濟發展史一書所改編重寫。取材極為豐富，持論亦稱公正，允推為蘇聯近代經濟發展史的權威之作。其內容不僅將其舊著的記事補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並且就蘇聯經濟建設的經驗，進而為計劃經濟的學理開闢一新的研究途徑，揭示出一種新的分析方法，治理論與事實於一爐，尤非學理與史實兼精如道伯氏者不能執筆。其第三卷中，對於蘇聯的計劃制度，專章論列，於計劃的編製程序和編訂方法，尤反復詳言，更特便於師法蘇聯的後進國家之參考。譯者爰不揣譾陋，亟加彙譯，以介紹於我國人。

原書脫稿於一九四七年七月。所紀事實，雖將蘇聯戰後的五年計劃包括在內；但所引材料，似斷自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度，去今又已三年。蘇聯於第二次大戰之中，在東戰線獨力與法西斯的武力相擯持，當戰事初期，敵軍深入腹地，西方工業精華所在，烏克蘭黑土肥沃之區，悉淪敵手，飽經蹂躪，創巨痛深。當本書屬稿之際，正蘇聯舉國上下埋首致力於戰後復興建設之初，其任務之艱巨，規模之浩大，直非言語所可形容，苟非親身體驗過蘇聯人民堅忍

卓絕的工作精神的人，自不敢輕易斷言說，如此的復興大業能夠在簡短的時期內完成。所以原作者在本書內有「在這種巨大規模的破壞之後，西方區域的經濟生活，不可避免的要用若干年的勞力來完成復原的任務」的推論。但是據蘇聯官方的宣布，原定在一九五〇年完成的戰後五年計劃，現在已提前完成，而且有許多種的生產，還超過了預定的標的。是蘇聯在此數年中，不僅恢復了戰時農業的損失，而且還打破了戰前生產的紀錄。其積極從事復興建設的勞力，在戰後期間，似較戰前尤為驚人。祇以本書脫稿較早，致未及鉅入，不能不認為憾事。關於蘇聯近三年來的經濟發展，官方宣布的資料甚多，目前中蘇兩國的文化交流，愈趨密切，此類資料，蒐求較易，讀者如取與本書的推測相互比較，當可見本書對蘇聯的潛力，如何失之於估計過低，而同時蘇聯奇蹟式的戰後復興，也愈值得我們的敬佩和讚歎！

本書的譯作，開始於本年春夏之交。為希望本書能早日與讀者相見起見，趕在五個月內完成了這篇譯稿。時間的匆迫，加以譯者學識的蘊淺，舛錯疏漏之處，自知不免，尚希讀者不吝指正！

附註：原書封裏及底頁兩幅地圖均從略

譯者，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於上海。

目次

譯序

原序

卷一

第一章 導論

——蘇維埃經濟發展的研究在現時代問題中的意義——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俄國經濟發展

三九

第三章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前奏

七一

卷二

第四章 最初八個月

九七

第五章 『戰時共產主義』時代

一一五

第六章 轉入新經濟政策

一四八

第七章 經濟復興的初期和一九二三年的『翦形』恐慌	一七五
第八章 工業化問題	二〇九
第九章 第一次五年計劃前夕的土地情形	二四四
第十章 第一次五年計劃	二七〇
第十章附錄 蘇維埃的工業統計	三〇六
第十一章 第二次五年計劃	三一八
第十二章 第三次五年計劃與大戰及戰後復興建設的五年計劃	三四四

卷三

第十三章 計劃經濟制度	三七三
第十四章 財政金融計劃和財政金融制度	四一四
第十五章 工業的地區分佈	四六〇
第十六章 工會、工資、和勞工情形	四八六

蘇聯經濟發展史

卷一

第一章 導論

蘇維埃經濟發展的研究在現時代問題中的意義：

—

我們每一思考舊以俄羅斯帝國著稱的地域，在近三十年中所發生的經濟和社會變遷，只覺新奇和偉大爭眩耳目。在已往的任何時代中，曾否有過如此巨大的變遷，影響到地面上如此廣大的區域；而又發生在如此短促的時間以內，很是疑問。直至最近數年——事實上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的戰爭年代——西方各國很少有人能領會到前俄羅斯帝國內這種社會經濟改變的程度。幾乎每個人都對蘇聯官方所發布的各種計劃和成績表示懷疑；便是一般能夠獲致資

料並自命爲專家的人，對於這次改變也都過分的低估了牠的程度和經久性。某些人所以會抱着這種懷疑，固然確係因爲知識不足，有許多人，則可能是由於主觀思想的結果。但這班懷疑論者之中，儘有並無上述藉口，既非知識不足，也非缺少對於事實保持客觀態度訓練的人。看到一九三〇年間，許多有關蘇維埃聯邦經濟情形的私人談論和公私論著，則一九四一年華盛頓和倫敦當局的軍事預測，會對蘇維埃抵抗德國的能力，像現在可以看出是非常特別的悲觀，亦不足深怪了。

原稱蘇俄，自一九二三年後改稱蘇維埃聯邦的經濟發展史，所以值得現時代的特殊注意，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牠在歷史上爲工人階級形式國家（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下）實行剝奪前資產階級，並建立一種社會主義形式的經濟，提供了最初的實例，只此一點，已足夠使牠引起特殊的注意，對本世紀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家，與一七八九年後的法蘭西對前一世紀政治理論家和歷史學家引起同等的注意。但其次，牠也爲一個原來落後的國家，以空前未有的節拍，轉變爲一個廣泛工業化和現代技術的國家，提供了一個獨特的例證。這種轉變，不是靠國外大量輸入資本的協助，而是在一種國家經濟計劃的指導和管制下實現的，這種計劃，替代了以往作爲工業革命古典特徵的放任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資本企業環境。牠好像很可能又轉而成爲亞洲各國將來工業化的古典形式。印度和東南歐等國經濟建設計劃的討論，已很深切的受到牠的影響，牠在將來很可能更發生轉移經濟研究焦點的效果：爲經濟研究提供一組全新的問題，

爲經濟發展，開闢一種全新的展望。

戰前十二年間蘇維埃聯邦的工業發展，節拍既如此特殊，其對經濟學家所發生的主要興趣，當在牠對決定經濟發展的各因素方面所能作爲的說明。直至最近爲止，國內經濟學家所關注的，多是均衡(equilibrium)的研究，而非變動的研究。即使他們所注意的均衡是「移動的均衡」，也都是以對某些既定因素(例如：需求，人口，技術，資本)中若干「任意的」移轉作一連串的調整來加想像的，而這種調整的關係又大都是具有平滑而連續移動向量(vectors of movement)的。雖在近數年前，曾有人注意到波動級數(fluctuating series)和調整時差(time-lag of adjustment)的影響(遵循所謂「蛛網定理」cob-web theorem 的路徑)，至於移動率大於調整率時的情形則很少有人討論。如果說是由於偏好某一種解析方法的結果，致使經濟發展上若干最主要的特徵，尤其是類如由農業經濟轉變爲工業經濟，或由落後時代轉變爲高水準技術時代等重要轉變時期中的特別要點，竟從未經人討論，殆非過論。經濟學家大都偏向於一種觀念，認爲經濟問題的中心，在就多種各別的使用中求得資源的「中和」(optimum)分配，至於資源和用途，則均視爲已知的數量。兩次大戰之間，討論各經濟制度比較優點的經濟學家(包括某一時期的本書作者)通常都假定：任何制度的成敗，應視其在此方面能否成功以爲斷(通常並含有：只有運用價格制度，不但是消費物品的價格，且包括中間產品和生產因素價格的價

格制度，才能充分完成這種任務的意義），①至於一種經濟情形連同其既定的資源組合和需求形態，能否順利發展為另一經濟情形，也許比牠在某一情形中能否達到完全均衡，更足為該一經濟制度對人類福利貢獻的決定性測驗，這種觀念倒極少引起注意。②好像一個人專力致志於一種器械的完成，以便用以精確的測定某一山脈的高峯所在，而對附近地帶的何山最高和攀登山頂以何徑最捷，反置而不究。

但是主要的問題，還不止是要犧牲均衡而改論進步，並就我們在某一時間內所有的一切，以求最大的效果。當我們將注意焦點轉向經濟發展的問題時，便發生了較此更形基本的問題。我們不久便會因覺到這類問題所表現出來的經濟世界，其景象與經濟學家所通常表現的截然不同而感到錯愕。實際上，這類問題，很少或從未備具經濟學家所通常表現的形式，即是：可以按照某一理想的標準就無量數的經濟型範或途徑中，選擇一最佳的型範或途徑。牠所注意的，彷彿是要發現當前的局勢如何會「限制」了我們選擇的可能。主要的問題，不復是無限多數的目的和分配於各目的之間的有限工具，有無量數的可能型範來供選擇，而轉變為實際可供選擇的目的，本身即為現有工具所局限，能供選擇的可能，只是少數而非多數的組合(combination)。果然如此，則經濟研究的重點，將不可避免的要轉移到如何在事實上闡釋這種經濟行動限制的研究：亦即對決定何種發展為可能的特定情形，研究其特點何在。

這裏不是退而討論經濟方法論基本前提的所在。只能以另一種對經濟事件、織地的假定，來

說明問題的所在，並強調另作這種不同假定的若干含義。傳統的方法，及其將經濟數量視為連續變換的對象，所需要的生產（以及消費者的欲望）性質，是要使各種生產間的生產資源分配，能作很大（與欲望的標準相對而言）的變換。生產資源必須有高度的改造性；生產資源的分配，可以組織成多種的可能型範。在消費者的欲望方面，也必須與供應各種欲望的物件所能錯綜變合而無損於消費者的程度，有同等的彈性。這種經濟情景象的根據，其中似有一暗含的假定，認為在生產方面，因基本技術單位的規模，和各類生產（如連帶供給關係等）間相互依賴性而造成的「不可分割性」，在我們觀察事物的比例上，比較渺小，而在需求方面，消費者對某些特殊物品的特殊需要，大都是相互獨立的，也就是說，每一物品都是與其他物品相互競爭的，而這類可以同樣滿足消費者的物品，有很大數目的可能組合。

反之，如果生產方面的所謂「不可分割性」，在我們考驗問題時所用的標準比例上，相對的大，則情形便告改觀；如果構成消費者需求總額的各項目，形成密切而相互關連的一組，大部份因例如社會習慣或各個欲望間的補充性連鎖混合而成為具有整個有機體性格的各種「生活方式」或行為型範，其情形亦與上同。^①在這種情形中，欲以有限資源，就消費者於可能獲致時所願得到的 n 種物品，「每一種」各生產「若干」數量，是不可能的。為要生產其中任何（或許多）種類的物品，必需以最小的規模來進行其生產，即此最小的規模，已足使可以同時生產的物品種類大見減削。生產若干 a ，不僅是減少了能夠生產 b 的數量；且可能完全排斥了

生產任何b的可能。因此，生產資源分配的可能型範，比較稀少。n種物品中只有一小部份能得生產，其所生產的每一種物品又必須各有一最低的數量，因此，在實際意義上，能夠進入市場的各種產物，其相對比例，是不能有多大變換，而且是由生產技術條件在相當狹隘限度內來加以決定的。④如果，消費者方面，對各種物品的欲望可以類別為組，每組之中有聯合的需要。⑤而每組中的各項又不易與另一組的項目相混合，則編製生產計劃者所面臨的各種物品可能組合，為數更少。在既定的生產資源數量之下，可能的問題，將為如何將此資源分配於甲組或乙組或丙組物品的生產，可能選擇的組數，比較甚少——是就若干相互排斥的菜單中擇定一種「公司菜」，而不是就適合消費者需要的比例在冗長的「點菜單」上酌定菜餚的更複雜任務。

經濟情形與上述的情形愈形接近，則經濟計劃問題，與軍事策略問題亦漸相似，事實上的選擇，只限於比較少數的計劃，須各視為整個的有機體來加取捨，而各個計劃，又因種種原因，不易割裂混合。⑥這種情形，需要將力量集中於一二主要目標，不可使資源分散於廣泛的範圍。

在相當長久的時間中，生產資源事實上究有多少改造性，或消費者的欲望型範究竟有無彈性，未便在此處詳加探討。惟有一特殊原因，使我們方才提出的問題，對於經濟計劃問題，較在初視之下，關係更為密切。這便是生產資源因在某一時間構成既定型範而具有的經久性，和在相當時限以內加以改變所需要的高成本，使牠在短時期中，缺乏改造性：而所謂相當時限，

通常爲十餘年，有時竟至數十年。如我們將此一事實，與任何經濟計劃均局限於相當簡短的時期地平（time horizon）事實（即就時間地平超越某一定度以外，問題中所含不可知的數量必將急遽增加一點而論）合併以觀，則上述軍事策略選擇和經濟計劃選擇的取譬，已足使經濟學家，應對牠特別注意。至少，牠足以作爲一種警告，說明利用傳統經濟學家的鏡頭，觀察計劃問題，可能歪曲了我們的研究。

雖然，我們如不惜傷害某一經濟部門的將來生產力，願意並實行停止該一部門的修繕和置換工作，固可有相當的回旋餘地，但在此後數年中，可能從事新建設的數量（除輸入可能以外）必須受重工業現有產量能力的嚴格限制，則至爲明顯。同樣的，在最近將來期內，實際可能的消費數量也將以消費品業的現有產量能力爲其條件；減低消費或建設，對於促進另一方面的擴展，未必能有立即的效果。但如設計機關所考慮的是攸關數十年的大計，則其可能選擇的範圍較廣；其可能組成的經濟型範亦較多。如在此期間的建設，多係致力於消費品工業設備的擴展，則此後數十年的消費可以較多；惟此一可能擴展率，仍將以原有製造此類工業設備的機廠能力和此項能力在此期間的擴展率爲其條件。否則，如在此期間將資源專注於重工業的擴展，增多鋼爐和可以製造機械工具的機廠數目，則此後數十年便可以保持一較高的投資率或建設率。每一個既定半徑的時間地平有一個相當範圍的選擇可能；而現有生產資源的型範和其改造性的程度，便是決定此種範圍的因素。這種地平在半徑愈長，可能選擇的範圍亦愈廣——各